

汉代 女性研究

田艳霞 著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

2012年辑

河南人民出版社

汉代女性研究

—※—

田艳霞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女性研究 / 田艳霞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5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2012年辑)

ISBN 978 - 7 - 215 - 08318 - 9

I. ①汉… II. ①田… III. ①女性 - 社会生活 - 研究 - 中国 - 汉代 IV. ①D691.9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7015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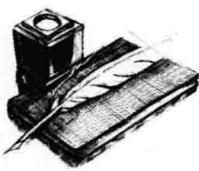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数 245 千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52.00 元



—2012年辑—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编委会

主任 李恩东 杨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喜成 王朝纪
关玉梅 张钢杰
李自强 李恩东
杨杰 孟繁华
唐玉宏

总序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社会公益性,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根基。为支持和鼓励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上交流平台,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总结原有资助出版经验的基础上,于2010年设立了《河南社会科学文库》资助出版项目,对入选的研究成果,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统一封面设计”的方式,提供全额资助,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统一编辑出版。迄今,已出版《城市发展战略》《中国城镇化研究》《强县扩权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等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深受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欢迎。

2012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也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为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河南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力促进中原经济区建设,保持河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策划出版了2012年度《河南社会科学文库》。它主要包括《中国农村金融排斥与包容——金融地理学视觉的分析》《中国创业型经济政策研究》《中原城市群空间联系研究》《食品安全:跟踪、预警与追溯》《论道德自我的价值实现》《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社会整合机制》《当代中国人幸福婚姻结构探微》《中华民族分裂时期统一策略研究》《汉代女性研究》和《文学的若干理论与当代问题》等10部著作,从不同层面反映了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充分展示河南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创造力。

《河南社会科学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工程。今后,我们将随着形势和

任务的需要,在省委和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紧密联系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科学地遴选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选题,不断推出新的有长期思想积淀的著作,并使之尽快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为加快推进河南振兴、中原崛起、富民强省提供有效的学理支撑。

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2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汉代女性观	15
一、王朝女性观	15
二、士人女性观	26
三、女性自身的观念	41
四、普通民众女性观	46
第三章 汉代女性家门之内的活动	56
一、汉代女性的名字	57
二、汉代女性教育	82
三、汉代女性婚姻	92
四、汉代女性的离婚与再嫁	112
五、汉代女性生育习俗	127
六、汉代女性化妆习俗	140
七、汉代女性情感生活	166
八、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	174
第四章 汉代女性家门之外的活动	187
一、汉代女性与政治	187

二、汉代女性与经济	206
三、汉代女性其他社会活动	222
四、汉代女性娱乐休闲和社交活动	226
五、汉代女性精神风貌	231
结语	238
参考文献	241

第一章 绪 论

“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逐步变成一个女人的……正是社会化的整个过程产生了这种东西……我们称之为女性气质。”^①这是西蒙·波伏娃的名言，它深刻地揭示了女性从一个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实质。从自然的女人转变为社会的女性，这是女人的社会化过程，但是，为什么要转变，如何转变，转变之后又会怎样？如果说这是一个个体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转变，那么，作为和男性相对的性别整体，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又经历过怎样的一次次痛苦挣扎呢？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性别间的不平等总是存在着、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这种性别之间的不平等不是某一阶级、阶层或某一群体的单方面行为，也不是单一的男性行为所造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发展的历史告诉了我们社会性别形成的过程：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按年龄区分的老少长幼，按性别区分的男女两性，并且按照这种基本区分开来分工协作，以便共同生存，这是自然的选择，也是生存的需要。这时的分工基本上是单纯的性角色区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然而“女人与男性最明显的差异是生育。在人类社会早期，生育对于女性的限制再明显不过了”^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

① [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①许多跨文化人类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类早期社会都有近似的性别分工模式:男性一般从事那些远离居住地,需要体力的工作;女性所从事的工作一般不需要太大的力量,而且离居住地更近一些,以便于照顾幼儿和群内之事。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两性之间“受到鼓励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不受性欲影响,而且和生殖无关”的性别活动,日益频繁,这样,“作为社会环境的产物”而非“男性和女性固有的个人特性”^②的性别角色就开始出现,成为此后男女性别发展的主要方向。大量新石器时期墓葬所呈现的男女葬式、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的前后差异,显示了当时的男女已经从性角色的差异向性别角色的区分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末期,男女的性别角色模式已经出现。^③不再依据生理性别,而是依据社会性别的分工安排,使得家人的照顾者、情感的抚慰者的女性,原有的优势成了劣势,她逐渐失去了对家庭、社会经济上的掌握,而男性从此站到了生产前线,成为社会发展、家庭生存的主要支持者,处于支配地位,拥有决定权,而女性却不得不把自己降到次要的从属地位,男女性别关系的不平等就此形成了。自此,社会性别制度作为一种隐性制度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规范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制约着其他社会制度的生成和制定,并且还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之下,女性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在家庭之内,变成了“内子”、“内人”、“贱内”,她们没有婚姻自主权、没有财产管理权、没有事务决策权、没有发展自我的权利,甚至有的时候,没有生命的权利,家庭就是她们的整个天地,丈夫、孩子就是她们的整个人生。

几千年来,女性一直处于如此被动和主动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转变是那么的痛苦和无奈,让身处其中的她们饱受折磨,却又泰然接受,最终成为这样一个群体:温柔,美丽,如一朵朵娇嫩柔弱的花朵,只能依附于男性这棵大树生存,却不再是一棵棵独立扎根于大地、能自我生长的树木。在这种社会性别制度的制约下,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男性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② [美]L.达维逊,L. K.果敦:《性别社会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 赵东玉:《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5期。

中心的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到今天依然存在,中国社会男婴远高于女婴的出生率,并且男女出生的性别比不断扩大,说明今天社会中的性别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在不断加剧。^① 这是我们今天进行此项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是由男女两性天生的性差异决定的,是生来如此的。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深入,以及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这一理论受到了深刻的质疑。^② 人们发现,男女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理决定,而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并且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处处都打上了社会文化的烙印,生理性别并不是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男高女低、男优女劣)才是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它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又通过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文化、科学、法律等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巩固,并且被规范化、制度化和模式化。于是,“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性别理论”出现了。“gender”这个词汇在中文中没有等义的对应词,甚至在英文中它也是一个“新”词,它原指语法中的性别,如阴性词、阳性词,近年来经过女性主义的重新解读,被用来特指男性与女性主体形成过程中,文化和社会的组织作用。^③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人们的性别可以分为:

生理性别。也简称为性别(sex),指两性在生理方面的差异。它主要是用生物标准来确定男性和女性,这种生物标准包括生理结构和解剖结构,生理结构主要指性染色体的差异,解剖结构主要指性器官的差异。生理性别与生俱来,后天无法从根本上改变。

^① 根据2004年9月9日的《中国社会报》报道,中国的性别比在不断上升,1990年的性别比是111.39(男:女),到了1999年达到了122.65。有些地区,如河南、安徽、江西、广东、海南等地,性别比已经突破了130,这大大超过了国际上107的警戒线。

^② 相关的研究和文章很多,如盖尔·卢宾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琼·凯利·加多的《性别的社会关系——妇女史在方法论上的含义》,苏珊·布朗米勒的《女性的人体形象》,卡洛琳·伍德·谢利夫的《心理学界的偏见》,等等。

^③ 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选自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社会性别。是指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巩固。它包括有：

- (1) 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造成男性和女性角色和行为差异的原因；
- (2) 社会对妇女角色和行为的预期往往是对生理性别规定的角色的延伸；
- (3) 人们现有的性别观念是社会化的产物；
- (4) 社会性别是可以改变的；
- (5) 社会性别制度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是随着时代不断演进的，对人类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

社会性别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代名词，也不是简单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结构，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途径。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性别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为重新思考性别问题、社会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成为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中用来阐释和分析问题的概念。社会性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会建构的；还有，对性别平等的追求不仅仅是女性单方面的要求，而是男女两性共同发展的要求。社会性别理论这一概念的出现，使人类对性别，尤其是对女性的认识产生了一个飞跃，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研究是女性史发展的新趋势，引入这种理论，使我们看问题时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研究，对于女性研究也会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把握。

女性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她们是人类之母，占人类总人口的二分之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然而，恰恰是她们最容易被遗忘，虽然中国是一个史料保存相对丰富的国家，可我们在史书上所能看到的有关女性的记载却相当少。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失语的一群”，中国古代历史不仅是由男性书写，更是书写男性的历史，男性是历史的言说者，说什么，如何说，由他们掌握。历史从来对女性的记载惜墨如金，如果对女性有零星的记载，那也是为了男性社会的需要，也是男性视野下的——即男性所欣赏、所褒扬或所贬斥的。历史早已消逝于不可复现的

岁月中,留下的只是史官有选择的记录,这种记录本身就是一个话语权利选择的结果。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

妇女史的关键因素不是民族和阶级,而是父权制,即家长拥有对他妻子和孩子的权力,通过延伸,更普遍地指向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因为,主流历史学隐瞒这一事实,所以他们写出的历史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而只是对人类一半人口的片面的记叙。借用一本颇为流行的女权主义者的作品的书名来表述,就是那些被“从历史中隐去”的命题。^①

同时他又借用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所说:

大多数女性都感到她们的性别并没有一种引发人们的兴趣或应该被特别关注的过去,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不过,像少数民族群体一样,女性不可能承受缺乏集体认同意识的代价,而这种认同意识必须包括有关过去的共同意识。没有这种共同意识,一个社会群体就会患上一种集体健忘症,使她们易于被强加上已经受到她们质疑的陈规,并在应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的标准上被强加一种偏见。^②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有必要对古代女性进行研究,在过去的岁月中,女性有着怎样的生活,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什么会转变,如何转变,是主动的行为还是被动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探索这一转变过程,以及女性在历史上真正的生存状态,使现代的人们能更充分地了解女性生产、生活和发展的历史,以更好地促进当今社会的两性和谐,促进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我们进行女性史研究的历史意义所在。

如何界定研究对象,是研究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书以汉代女性为

^① [英] 约翰·托什著,吴英译:《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② Sheila R. Johansson, “‘Her story’ as history: a new field or another fad?” in Berenice A. Carroll (ed.), *Liberating Women’s History*,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27.

研究对象。

“女性”、“妇女”都是现代词汇，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不曾出现过。清朝官吏陈弘谋在《教女遗规》序中写道：“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①明确指出了古代“女”和“妇”是两个概念，女子一生分别有三种不同身份或称呼，都是相对于不同的男子而产生的，是一种从属性的身份，因此，女子终其一生，从来不曾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一个可以贯穿其一生的社会性身份或称呼。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古文的传统语境中，“妇”和“女”属于截然不同的认知范畴，它们既没有同一性，传统中国也因而没有“女性”(women)这一身份属性。^②一直到了清朝末年，由于维新运动的兴起，“女子”一词才开始被频繁使用，成为当时约定俗成的对女人的通称。能界定女人社会性身份的“女性”、“妇女”等词汇出现得很晚，金一写于1903年的《女界钟》被学者李小江称为中国第一部妇女理论专著，但是直到这本书的写作年代，“女性”、“妇女”仍没有被作为对女子的通称。学者李小江指出：“金一的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使用‘妇女’这一词汇，最多使用的是‘女子’、‘女人’、‘妇人’，还有‘同胞姊妹’——‘同胞姊妹’像是‘妇女’诞生之前男人对女人最具平等意识、最富激情的称谓。”^③“妇女”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以及五四以来对女子解放的倡导而出现的新词汇，大致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妇女”一词在使用频率上居于突出位置，如1937年以后，各地女界办了不少刊物，多冠以“妇女”之名。^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妇女”一词的使用仍居于主导位置，如女界权威组织机构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女界权威报刊称《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等。而同样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女性”一词，更具有反叛意义，是作为一种被解放了的女子的符号而出现的。在我们

① 参见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② [美]白露：《女性的理论化：妇女、国家、家庭》，载《身体、主体和权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③ 参见李小江：《女人读书——女性/性别研究代表作导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④ 抗战期间，桂林创办《妇女岗位》，广州创办《抗战妇女》，重庆创办《职业妇女》，上海创办《慈俭妇女》等刊物。

当前的语境中，“妇女”与“女性”并存，从词汇的内涵上看，“妇女”更多的是国家所塑造的一个政治用语，是党在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国家政治时而塑造的一个政治范畴；“女性”则是妇女个性身份的表现。从时间上说，“女性”往往包含了女人的一生，既可以指已经结婚的女人，也可指未婚的年轻女子，涵盖的时间长度相对更长；而妇女一般指的是有一定年纪和经历的女人，或结婚后的女性。我们在采用这两个词汇时，综合考虑了上述因素，认为使用“女性”这个词，涵盖面更广泛一些。然而，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为了行文的方便，有时也会出现“妇女”与“女性”兼用的情况。

本书研究的时间限定为汉代，开始于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汉朝，结束于公元 220 年曹丕代汉。但是，历史的划分从来不是那样简单划一的，我们所要研究的人物很多生活跨度都延续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对于这些人，我们一般以其主要生活的年代或者影响力强的年代为主。如汉初的很多女性人物在秦末战争期间就已经出现，我们一般把其归为我们研究的范围。有些特殊的、比较难于把握的人物，如在楚汉战争中自刎而死的王陵之母，她舍生取义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汉代人，汉画像砖、画像石常常把她作为刻画的对象，所以我们也把她作为我们探讨的人物之一。再如，我们在研究女名时，也探讨了三国初期的一些女子名字，因为名字往往是父母所命，反映的是父母的期望，因此三国初的一些女名实际是汉末社会思想、风俗的表现。除了时间划分的复杂性，研究主体的复杂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女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她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层，生活于不同的地区，有着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构成复杂的特点，同时又因为性别的同一性有着某些共同的境遇与利益，生活在汉代的女性，必然也带有这样的特性。女性研究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时有交织，给我们的研究也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特定女性特殊的一面，正如陈东原在其《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所说：“我这本书不是要称颂什么圣母贤母，也不想推崇什么女皇帝女豪杰给女性出气，因为这一班人与大多数的妇女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①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对一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加以研究、归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19 页。

纳,以期对汉代女性的整体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有一个较全面的把握。

我们所要研究的汉代女性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

(一) 政治背景

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最终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结束了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西汉王朝,初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此后几十年间,统治者忙于削平异姓诸王和同姓叛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凭着前期国家的经济积累和安定统一,从元光二年(前 133 年)开始与匈奴作战,经卫青、霍去病等多次大规模出击,至元狩四年(前 119 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①,自今日甘肃凉州以西,至玉门关一带,都属于西汉控制的地区。太初三年,即公元前 102 年,李广利征服大宛,更是把汉朝的势力推进到中亚,此后,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同时,在中央政权上,汉武帝时期也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从公元前 140 年至前 49 年,西汉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繁荣富强的国家。但与此同时,农民的生活也开始不断恶化,成帝时,西汉政权走向了衰落,至哀帝时,农民已经是有七死而无一生^②,于是各种形式的骚动不断爆发,而王莽篡权后的改革,不仅没有挽救其命运,反而促进了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在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与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刘秀夺得帝位,重新使混乱的局面转为统一。经过半个世纪发展,东汉王朝得到复苏,并在和帝时达到全盛,但是这一时期并不太长久,安帝即位后,东汉政权就开始走向衰落。一代一代的母后立制、外戚专政、宦官掌权,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也迅速激化,边疆各族叛乱不断,人民失去土地,变为赤贫,以至于陈蕃说:“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厄哉!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为三空。”^③农民暴动不断,据史料记载,自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到灵帝中平元年(184

①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② 《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③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列传》。

年)共 37 年,农民暴动即有 22 次之多。在这危机之时,士大夫起来反对宦官,想改良政治,结果遭到失败,酿成党锢之祸,当时所有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遭屠杀或禁锢,文化也为之凋残。继之,黄巾大起义爆发,东汉政权也随之灭亡。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长期以来,秦王朝的横征暴敛以及战乱的过度消耗,造成了社会人口锐减,经济接近崩溃。《史记·平准书》论说汉初经济“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毋藏盖”。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新兴的汉王朝“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到汉惠帝时“民务稼穡,衣食滋殖”,经济情况已经大为好转;文景帝时,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经过西汉初期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更是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①。

东汉建立初期,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发展生产,如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26—38 年)曾六次发布解放奴婢的命令,多次给那些失去生产能力不能自存的农民以赈济,鼓励农民垦荒。在一系列政策鼓励下,社会逐渐安定,生产逐渐发展,经济很快就发达起来,都市也是一片繁荣景象:“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乡曲豪俊游

^①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